

刑法与刑事辩护

业务资讯



2023 年 3 月

刑法与刑事辩护业务研究会

2023 年第 3 期 业务资讯

主 任：马 朗

副主任：寇树才

裴长利

王恩海

编 辑：欧阳晓滨

行业简讯

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迎两会·新时代检察这五年”系列首场新闻发布会

公安部部署推进打击惩治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

新规速递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与北京市公安局联合会签《协同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指引》

指导案例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新业态治理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行业简讯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迎两会·新时代检察这五年”系列首场新闻发布会

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迎两会·新时代检察这五年”系列首场新闻发布会。此次发布会以“做优新时代刑事检察”为主题，通报检察机关持续做优刑事检察工作，服务保障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据最高检新闻发言人李雪慧介绍，为迎接全国两会胜利召开，让社会各界特别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更好地了解检察工作，从2月15日开始，最高检将举办“迎两会·新时代检察这五年”系列新闻发布活动，结合重点检察办案数据和典型案例，系统介绍五年来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举措成效。

检察机关5年追诉刑事犯罪583万余件

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孙谦在发布会上介绍，2018年至2022年底，检察机关共追诉刑事犯罪583万余件，比前五年上升9.5%。其中危害公共安全犯罪43.5万余件（不包括危险驾驶罪），严重暴力犯罪23万余件。起诉黑恶犯罪4.2万余件，起诉黑恶势力“保护伞”3600余人。

上百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被公诉

孙谦在发布会上介绍，五年来，检察机关共起诉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7.8万余人，其中对孙政才、赵正永、孙力军、傅政华等100余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提起公诉；把“围猎”国家工作人员等作为惩治重点，五年来共起诉行贿犯罪1.1万余人。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

孙谦在发布会上介绍，2022年起诉杀人、抢劫、绑架等暴力犯罪人数为近二十年来最低，严重暴力犯罪起诉人数占比由1999年25%下降至2022年3.9%。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轻罪案件占85.5%。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

五年批捕 423 万余人，不批捕 159 万余人

孙谦在发布会上介绍，2018 年至 2022 年，公安机关提请逮捕人数 585 万余人，经审查，批准逮捕 423 万余人，不批准逮捕 159 万余人（占提请逮捕人数的 27.3%）。对依法不应当立案而立案，通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13 万余件；对依法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12 万余件。

检察机关近 5 年提出抗诉 4.1 万余件

孙谦在发布会上介绍，2018 年至 2022 年，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 4.1 万余件，较前五年上升 18.9%；法院已审结 3.1 万余件，其中改判、发回重审 2.2 万余件。最高检带头办理刑事抗诉案件，先后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 7 件。

被告人认罪服法成常态，一审服判率达到 95%以上

孙谦在发布会上介绍，2020 年以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检察环节制度适用率均在 80%以上，被告人认罪服法成为常态，一审服判率达到 95%以上，从源头上实现定分止争、化解矛盾。

2020 年以来发出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 4.9 万余件

孙谦在发布会上介绍，五年来，检察机关紧密结合办案，围绕金融监管、网络整治、快递安全、安全生产等工作中存在的社会治理问题，向有关部门发出完善制度、堵塞管理漏洞的检察建议，促进社会治理的完善，尽可能减少和避免犯罪的发生，2020 年以来发出此类检察建议 4.9 万余件。

准确把握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要从两方面分析

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陈国庆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一方面对严重犯罪应当依法严惩，另一方面对轻微犯罪一般应体现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取向。当前，轻微犯罪占比已经超过 80%，应当尽量从矛盾化解、分化犯罪、减少对立、促进和谐角度规范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少捕慎诉慎押绝不是放纵犯罪

陈国庆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少捕慎诉慎押绝不等同于只讲从宽而不讲从严，更不是放纵犯罪。要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全面准确把握“宽”与“严”的辩证关系，充分考虑具体个案的特殊情况和社会公众的心理感受，区分情形、区别对待，对严重犯罪依法从严从重，对轻微犯罪特别是认罪认罚的依法从宽从轻，任何时候不能顾此失彼，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并不是一味从宽。

依法及时核准追诉陈年命案

最高检第二检察厅厅长元明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严重刑事犯罪是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公然侵犯和对社会秩序的公然挑衅。对于极端暴力犯罪，犯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报复社会、后果严重的，检察机关均第一时间介入侦查，确保依法从快批捕起诉。对于陈年命案，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影响未消除、群众反映强烈的，依法及时核准追诉，坚决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18万余人涉各类金融犯罪被起诉

最高检第四检察厅厅长张晓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5年来检察机关共依法起诉各类金融犯罪18万余人。严惩“伪金融”“假私募”等非法集资犯罪，办理“泛亚案”等一批重大犯罪案件，助推风险出清、精准拆弹。全力打击洗钱犯罪，2022年起诉2500余人。严惩非法控制金融机构、掏空资产犯罪活动，起诉涉银行信贷犯罪1.6万人。

联合设立4300多个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实施一年多来，各地公检机关在市区县公安机关执法办案中心联合设立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4300多个。2022年，依托重大疑难案件听取意见等机制，检察机关适时介入案件21万多件，同比上升26.6%。

行贿犯罪涉案百万元以上人数占47%

最高检第三检察厅厅长史卫忠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行贿犯罪案件出现一些新特点：部分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党员干部，巨额行贿、性质恶劣、危害严重，如行贿犯罪

涉案数额在百万元以上的人数占比从 2018 年初的约 14% 上升至 2022 年的 47%；长期行贿，向多人、多次行贿犯罪较为常见；单位行贿犯罪问题逐渐凸显。

量刑建议采纳率逐年提升

苗生明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稳定保持在 85% 以上，量刑建议采纳率逐年提升，被告人上诉率、刑事案件申诉率逐年大幅下降，表明绝大多数被告人是在认罪悔罪状态下接受审判、服从判决、服刑改造、进而回归社会，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公安部部署推进打击惩治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

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惩治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电视电话推进会于2月16日召开，通报总结专项行动进展成效，对专项行动进行再部署、再推进。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公安部党委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采取强力措施，全力推进打击惩治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取得新成效，努力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作出新贡献。

会议要求，要高度重视黑恶犯罪向网络发展蔓延的严峻态势，充分认清涉网黑恶犯罪的严重危害，把打击惩治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作为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工作统筹，始终保持对涉网黑恶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确保专项行动各项措施落地落实。要进一步强化侦查打击，确定目标案件，依法速侦速破，全力追赃挽损，高效抓捕涉网黑恶犯罪分子，坚决遏制此类案件多发高发势头。要以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负面舆情敲诈、网络水军滋事等犯罪为重点，坚持分类施策，依法严厉打击。要对重点案件进行挂牌督办，把打击犯罪主体组织作为核心目标，坚决断根清源、打深打透。

会议要求，要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加强犯罪研究和法律政策支撑保障，建立刑侦、网安等警种预警防范、联合打击机制，并坚持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强化对网络黑灰产业的综合打击整治，压实互联网公司主体责任，推进行业领域深度治理，提升一体化打防管控效能。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针对易受害群体开展精准覆盖宣传、典型案例宣传，有力震慑违法犯罪分子，有效提升人民群众防范意识。

据了解，2022年公安部会同中宣部、中央网信办等八部门部署开展打击惩治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共打掉涉网黑恶犯罪团伙400余个，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20余个、恶势力犯罪集团320余个、其他涉恶犯罪团伙50余个，破获各类案件8800余起，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

公安部公布打击惩治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五起典型案例

2022年，公安部会同中宣部、中央网信办等八部门部署开展了打击惩治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公安部2月16日公布了打击惩治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5起典型案例。

安徽阜阳赖某华等人跨境裸聊敲诈案。2022年5月，安徽阜阳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长期盘踞境外从事跨境裸聊敲诈勒索的有组织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0余名，破获刑事案件310余起。经查，犯罪嫌疑人赖某华等人在缅北地区设立窝点，以高薪工作为由，引诱数十名境内公民偷渡前往，随后通过殴打、拘禁等暴力手段进行非法控制，有组织地针对境内公民实施裸聊敲诈等违法犯罪活动。该团伙与境内“引流”团队合作，在各类交友软件上以“招嫖”“网恋”“裸聊”等信息引诱受害人添加犯罪嫌疑人QQ好友，诱骗受害人通过链接或二维码下载安装带有木马病毒的App软件，窃取受害人手机通讯录等信息，并通过QQ视频通话截取、录制受害人不雅视频，以向通讯录亲友发送不雅视频为由进行威胁、恐吓，反复索要“视频删除费”“保密费”，逼迫部分受害人向亲友、小额贷款公司借贷，甚至裹挟受害人共同实施敲诈勒索犯罪活动。目前，检察机关已对该案依法提起公诉。

湖南岳阳周某等人跨境裸聊敲诈案。2022年7月，湖南岳阳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主要从事跨境裸聊敲诈勒索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同步捣毁境内“跑分”洗钱团队4个，抓获嫌疑人80余名，破获刑事案件300余起。经查，犯罪嫌疑人周某等人在缅北设立窝点，以高薪工作为由，引诱数十名境内公民偷渡前往，在各类交友软件上以“招嫖”“网恋”“裸聊”等信息引诱受害人添加QQ好友，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该团伙利用毒品逼迫成员继续参与实施违法犯罪，甚至直接对内部人员进行敲诈勒索，“吃干榨净”后再要求其家属支付高额赎金，将不服其“管教”、无钱可榨的人员高价转卖至其他犯罪窝点。目前，检察机关已对该案依法提起公诉。

福建宁德柯某锋等人网络套路贷案。2021年7月，福建宁德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主要从事网络套路贷的有组织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破获刑事案件20余起，查扣涉案财产2亿元。经查，犯罪嫌疑人柯某锋等人在福州市成立无网络贷款资质的“佰仟借条”公司，利用“借贷宝”平台，通过制造虚假流水、恶意垒高债务、软暴力催收等手段，长期有组织地实施网络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该组织利用非法获取的公

民个人信息，通过“免抵押”“快放款”“低利息”等广告吸引受害人与其联系，在审核资质时获取借款人身份资料、照片、手机通讯录等信息，约定收取放贷金额30%左右的“砍头息”，利用“借贷宝”平台注册的放贷账户与受害人签订借贷合同，虚增与“砍头息”金额一致的“保证金”，制造出与合同金额一致的虚假流水，再用支付宝账户回收“砍头息”“保证金”“展期费”“逾期费”等费用，形成远超实际借贷金额的债务关系。为催收非法债务，组织催收人员持续通过软暴力方式逼迫受害人给付财物，大量受害人陷入债务深渊，有的甚至绝望轻生。目前，审判机关已对该案依法作出一审判决，柯某锋等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洗钱罪等罪名，数罪并罚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至五年不等有期徒刑和相应的财产刑。

河南周口杨某翔等人软暴力催收案。2022年3月，河南周口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主要从事软暴力催收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80余名，破案130起，查扣涉案财产2000余万元。经查，犯罪嫌疑人杨某翔伙同郑某领等人在福建福州、厦门等地成立无网络贷款资质的网络放贷公司，以“低利息、无抵押、放款快”等广告吸引受害人借贷，有组织地实施网络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并组织人员使用软暴力手段催收非法债务。该组织利用已获取的受害人身份资料、手机通讯录等信息，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对受害人进行辱骂、威胁，向受害人通讯录亲友大量群发欠钱信息、侮辱信息、伪造的灵堂照片等，甚至使用电话“轰炸”进行骚扰。大量受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被迫支付不合理高额本息，并因巨额债务引发工作、婚恋、家庭等重大变故，有的甚至绝望轻生。目前，检察机关已对该案依法提起公诉。

山东滨州梁某海等人负面舆情敲诈案。2021年12月，山东滨州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通过网络媒体实施负面舆情敲诈勒索的有组织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余名，破获各类案件90余起，查扣涉案财产300余万元。经查，2015年9月起，犯罪嫌疑人梁某海为谋取私利，先后在一些新闻网站注册自媒体账号，并陆续招募人员以曝光单位、个人负面信息相威胁，通过索要“宣传费”“合作费”“删帖费”、强迫购买高价白酒等手段非法敛财。此外，梁某海等人还通过“线下举牌、线上炒作”手段插手民间纠纷，多次组织策划围堵闹事行为，录制视频虚构舆论热点，滋扰恐吓、打击报复他人。目前，检察机关已对该案依法提起公诉。

新规速递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与北京市公安局联合会签《协同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指引》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和《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相关要求，近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与北京市公安局联合会签《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公安局协同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主动担当作为，强化协作配合，着力构建检警协同的反诈新格局。

《指引》强调，全市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担当，以高度政治自觉和法治自觉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抓好抓实，加强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做到打击犯罪与诉源治理并重，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电信网络秩序。

《指引》要求，全市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要持续形成合力，紧盯电信网络诈骗及其上下游关联犯罪的变化趋势，毫不动摇坚持“严”的主基调，坚持依法打击和追赃挽损并重。加强案件反向审视，强化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风险防控，铲除涉诈犯罪滋生土壤。针对电信网络诈骗技术迭代升级等特点，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辅助办案，做到科技反制、科技取证、科技研判，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信息化和现代化。

《指引》提出，全市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根据工作实际，建立健全提前介入、挂牌督办、追赃挽损、诉源治理、反诈宣传等十项协同工作机制，全链条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其上下游关联犯罪，全面推进检警联动反诈，共同探索全链条打击、一体化治理新路径，服务保障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指导案例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典型案例

一、焦某卫等14人盗窃（文物）、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基本案情】

2013年至2017年，被告人焦某卫等14人为牟取非法利益，结成盗窃、销售古建筑构件的犯罪团伙，在山西、河南、河北三省30余县区先后作案23次，窃得古建筑构件共计94件，并将其中琉璃砖、琉璃钉牌、琉璃瓦、木雕、屋脊、琉璃狮子、花雕、镂空雕花、屋脊砖雕、青石狮子、雕花青石门墩、墩鼓石、石柱础、木雕雀替、狮子砖雕、老式宫灯等出售，获利8.74万元。被盗古建筑多属元、明、清时期所建，不同程度受损，其中，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

【裁判结果】

山西省陵川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焦某卫等13名被告人盗窃古建筑构件，均构成盗窃罪。本案系预谋作案、团伙作案、交叉流窜跨地域作案，盗窃人数多、次数多，采取破坏性手段盗窃，造成文物保护单位遭破坏，社会危害严重。被盗古建筑构件经鉴定属于一般文物，依照相关司法解释规定，5件一般文物应视为高一等级的三级文物；盗窃一般文物、三级文物，应当分别认定盗窃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根据窃得文物等级、数量，焦某卫等13人分别构成盗窃数额巨大、数额较大，部分被告人具有累犯、前科或者坦白、自首等情节的，依法予以综合考量，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至六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至5000元。被告人张某明知盗窃的文物而收购，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各被告人非法所得予以没收。追缴被盗古建筑构件，返还原单位。

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盗窃文物引发的刑事案件。山西是中华文明和黄河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地面文物占中华文物存量的六分之一，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531 处，居全国第一，打击文物犯罪、加强文物保护任务更加繁重。本案属于跨省域团伙犯罪，被告人流窜作案，采取破坏性手段盗窃近百件古建筑构件，严重危害文物安全和社会治安。人民法院准确把握、严格执行司法解释规定的盗窃文物行为的法定刑幅度认定标准，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坚持重拳出击、严厉惩治犯罪，又坚守法律底线、防止“拔高”处理，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同时，在一审判决判项中逐列明应当追缴、返还的文物，不设时限、一追到底，最大限度保障被盗文物单位的合法权益。该案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严惩盗窃文物犯罪的决心和成效，对司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具有示范意义。

二、鲁某、罗某才故意损毁文物案

【基本案情】

安徽省繁昌县东辉中草药种植专业合作社是一家从事中草药种植、销售等经营活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鲁某为该合作社负责人，罗某才为股东。2012 年 4 月，该合作社承租繁昌县平铺镇某村约 200 亩山林，准备用于种植草药及苗圃。因该片山林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皖南土墩墓群范围内，同年 5 月，鲁某与繁昌县文物局签订了文物保护责任书，承诺不使用挖掘机施工作业。但在皖南土墩墓范围内施工的过程中，鲁某、罗某才仍擅自使用挖掘机进行清理表层土壤、挖沟等作业。同年 10 月，繁昌县文物局执法人员巡查时发现该情况并予以制止。经鉴定，皖南土墩墓本体受到严重破坏。

【裁判结果】

安徽省繁昌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鲁某、罗某才故意损毁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均构成故意损毁文物罪。二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1万元。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故意损毁文物引发的刑事案件。案发地位于皖南土墩墓群范围内，该墓葬群及其出土文物集中反映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社会生产、生活状况，是研究吴越文化的重要资料，对研究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和周边文化的关系、中华文明的一体化进程等重大课题具有重要意义。鲁某、罗某才在与繁昌县文物局签订文物保护责任书后，仍然明知故犯，严重破坏皖南土墩墓本体，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人民法院在依法审判的同时，采取“以案说法”形式在皖南土墩墓群保护区内进行宣讲，引导社会公众提高文物保护意识和自觉性，起到了“惩处一个、警示一片”的教育作用。该案是人民法院、文物行政部门秉持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依法履职尽责，通过严格妥善查处发生在人民群众周边、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件，努力提升文物保护水平和效果的代表性案例。

三、张某杰、王某涛过失损毁文物案

【基本案情】

2019年，洛阳某热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承包河南省洛阳市洛白路供热主干线工程，其部分施工区域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汉魏洛阳故城保护范围内。同年6月15日，该公司项目经理韩某兵通知三标段工队负责人即被告人张某杰将施工现场的结构层沥青、混凝土垫层清理掉，露出原土即可。张某杰对此没有理解清楚而继续施工，并雇佣无操作资质的被告人王某涛驾驶挖掘机作业。次日凌晨，张某杰、王某涛在施工过程中没有尽到注意义务，造成一古墓葬券顶完全破坏。经鉴定，挖掘行为损毁东汉时期古

墓葬，局部破坏汉魏洛阳城遗址本体，对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造成严重破坏。2019年9月25日，洛阳市文物局对洛阳某热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罚款30万元（已缴纳）。

【裁判结果】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杰、王某涛过失损毁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造成严重后果，均构成过失损毁文物罪。二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过失损毁文物引发的刑事案件。汉魏洛阳故城前后延续使用近1600年，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都城，是汉魏时期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现存遗址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特别是在文物保护范围内，建设施工单位及相关责任人更要按章作业、尽到注意义务，损毁文物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张某杰、王某涛在施工中过失损毁汉魏洛阳故城保护范围内的古墓葬，造成严重后果，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施工单位没有尽到管理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对二被告人定罪量刑，文物行政部门依法对施工单位予以罚款的行政处罚，展现了多元治理、全面追责、共同提升文物保护水平的鲜明导向和工作实效，对引导社会公众提高文物保护意识、建设施工单位及相关责任人提高文物安全责任意识，具有重要警示和教育意义。

四、霍某程等11人倒卖文物案

【基本案情】

2019年至2020年，被告人张某煜、马某全、雷某河、雷某刚、袁某华多次进入新疆罗布泊保护区，非法获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被告人霍某程以出售为目的，从被告人依某、张某煜、马某全、马某庆、孙某杰、雷某河、马某英、袁某华、阿某处，收购由罗布泊古楼兰遗址出土的打砸器、石器器物百余件。经鉴定，霍某程买卖、储存二级文物6件、国家三级文物23件；依某买卖二级文物3件、国家三级文物8件；张某煜买卖、储存三级文物24件；雷某河、马某英买卖、储存二级文物1件、三级文物5件；马某全买卖二级文物1件；马某庆买卖、储存二级文物2件、三级文物6件；孙某杰买卖三级文物2件；雷某刚买卖、储存三级文物10件；袁某华买卖、储存三级文物3件；阿某买卖三级文物1件。从上述人员的经营场所，还查获国家禁止经营的其他文物1180件。

2019年9月、2020年1月，被告人霍某程先后两次通过手机拍卖软件“微拍堂”，将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七克台镇收购的1个石杵和1个石矛出售给他人，共获利3306元。经鉴定，上述石杵、石矛均为三级文物。

【裁判结果】

哈密铁路运输法院认为，霍某程等11名被告人以牟利为目的，出售或者为出售而收购、运输、储存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均构成倒卖文物罪。霍某程等8人分别倒卖二级文物或者5件以上三级文物，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孙某杰等3人倒卖三级文物，属于情节严重。依某等7人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袁某华等3人具有坦白情节，可以依法从宽处罚。霍某程等11人均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判处霍某程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5万元；分别判处依某等10人有期徒刑三年至六个月，缓刑四年至一年，并处罚金8000元至2000元。追缴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没收扣押在案的文物。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倒卖文物引发的刑事案件。涉案文物主要来源于新疆罗布泊保护区，该保护区内有小河墓地、楼兰故城遗址等多个重点文物保护区域，分布了大量珍贵文物和文化遗址，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依某等人违反国家文物保护法规，多次进入罗布泊保护区非法获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在当地自发形成的文物经营市场内出售，霍某程以出售牟利为目的大量收购、运输、储存文物，并利用互联网拍卖变现，均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本案倒卖文物行为呈现出规模化、产业化、网络化特点，涉案文物数量巨大，包括数十件二级文物、三级文物，严重破坏罗布泊保护区的地理、文化原貌和文物安全。人民法院坚持“全链条、全要素”打击，依法严惩倒卖文物行为，同时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挥了刑事制裁的惩罚与教育功能，为从源头遏制倒卖文物犯罪、加强文物市场监管、堵塞文物保护工作漏洞，提供了法治指引。

五、姚某忠等12人抢劫、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倒卖文物案

【基本案情】

2012年至2014年12月，被告人姚某忠纠集、指挥被告人刘某等10人，在辽宁省凌源市、建平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朝阳市龙城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多次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被盗掘地1处为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古遗址、1处为青铜时代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17处为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积石冢，其中3处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牛河梁遗址保护区范围内。经鉴定，盗掘行为造成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文物本体和历史风貌严重毁损，历史信息丢失；窃得玉镯子1对和双联璧、勾云形玉佩、玉镯、玉箍各1件，均为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一级文物。

2012年6月至2014年11月，被告人姚某忠倒卖玉镯、马蹄形玉箍等一级文物15件、二级文物1件，共获利195万元；被告人李某宝倒卖玉镯、玉环、玉蝉形饰等一级文物8件、二级文物和三级文物各1件，共获利48.5万元。

2014年10月，被告人姚某忠纠集多人（均另案处理），经事先策划，采用暴力手段劫取被害人冯某所持文物等财物。经鉴定，被劫财物中有二级文物2件，三级文物、一般文物各1件。

【裁判结果】

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姚某忠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财物，构成抢劫罪。其抢劫二级文物，属于抢劫数额特别巨大。姚某忠等11名被告人违反国家文物管理法规，擅自挖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均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姚某忠等人多次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盗掘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并盗窃珍贵文物。在共同犯罪中，姚某忠等7人系主犯，其他4人系从犯。姚某忠、李某宝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均构成倒卖文物罪，情节特别严重。对姚某忠等人所犯数罪，依法并罚。对姚某忠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他被告人分别判处或者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2万元”不等的刑罚。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对各被告人的定罪量刑。

【典型意义】

本案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及倒卖文物、抢劫文物引发的刑事案件。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其牛河梁遗址为中华文明史前溯千年提供了有力物证，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本案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被盗掘的系列案件之一，人民法院针对本案已形成专业化犯罪团伙，实行资金提供、设备投入、勘探古墓、盗掘墓葬、销售分赃“一条龙”作业，涉案文物数量众多，非法获利数额巨大等特点，结合文物等级、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造成的损害结果，以及各被告人参与作案次数、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等因素，坚持依法重拳出击，全面打击文物犯罪网络，严惩文物犯罪团伙首犯，彻底斩断文物犯罪链条。该案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惩治和预防文物犯

罪、维护文化遗产安全的决心和成效，彰显了为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化提供强力司法保障的责任担当。

六、廖某尚等3人盗掘古墓葬案

【基本案情】

2021年6月，被告人廖某尚、卢某军、李某生伙同吴某强（在逃），经事先谋划、商定，携带金属探测仪和铁铲等工具，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兼爱乡某村附近一古墓群进行盗掘，挖开其中一座古墓，取出瓦坛、木条等物品。经鉴定，被盗掘墓葬系清代廖氏家族古墓群中的一座，为廖氏第六代廖某忠之墓；该墓群保存较好，形制和碑刻具有地方特点，碑文清晰，对研究当地人口迁徙历史及民族融合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属于受法律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廖某尚、李某生、卢某军违反国家文物管理法规，盗掘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墓葬，均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在共同犯罪中，三被告人均系主犯。三被告人均具有坦白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其主动赔偿廖氏族人，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盗掘古墓葬引发的刑事案件。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刑法保护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不以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为限；实施盗掘行为，损害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即属于犯罪既遂。清代廖氏家族古墓群虽未公布为不可移动文

物，但仍受法律保护。各被告人明知是古墓葬而实施盗掘，致使古墓葬本体完整性遭受了不可逆的破坏，即便没有窃得有价值的文物，亦应受到相应刑事制裁。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追究三被告人刑事责任，体现了全面维护文物安全的鲜明立场，对于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受法律保护的古墓葬及其价值、营造共同保护社会氛围，以及警示、震慑民间盗墓活动，具有积极意义。

七、王某等3人盗掘古墓葬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6年至2017年，被告人王某、王某1、王某枫在王某提议、纠集之下，时分时分或者伙同其他人，多次至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何山、横山、吴山岭、华山西峰、华山东峰、观山，以及吴中区羊肠岭、凤凰山等处盗掘古墓葬，其中，王某参与13次、王某1参与8次、王某枫参与11次，共计盗掘古墓葬14座。经鉴定，被盗古墓葬系苏州地区商周至清代古代墓葬，对苏州地方的历史、文化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盗掘行为对古墓葬本体造成了直接、严重的破坏。

经法院主持调解，王某、王某1、王某枫与公益诉讼起诉人（检察机关）达成附带民事赔偿协议，支付古墓修复费用及鉴定评估费用共计82349.59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王某、王某1、王某枫违反国家文物管理制度，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葬，均构成盗掘古墓葬罪。三被告人多次盗掘古墓葬，情节严重，应依法惩处。在共同犯罪中，王某、王某1系主犯；王某枫系从犯，依法减轻处罚。三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王某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本案绝大部分同种犯罪事实，可以依法从轻处罚。三被告人均认罪认罚，可依法从宽处理；已足额赔偿被盗掘古墓的修复费用及评估鉴定费用，可酌情从轻

处罚。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三个月至九年，并处罚金1.2万元至9000元。已扣押的赃物，予以没收，并责令三被告人按各自参与犯罪的数额，退赔尚未追缴的赃物（或折价款）；责令三被告人退出本案已追缴赃物的销赃所得。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盗掘古墓葬引发的刑事案件。被盗吴楚贵族墓葬群是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具有较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王某等人先后实施十余次盗掘，对古墓葬本体造成了直接、严重的破坏，也对古墓葬群的自然、人文环境造成了损害。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同时，依法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人民法院坚持严格依法确定法定刑幅度，坚决严惩盗墓行为，同时注重运用恢复性司法规则，鼓励被告人主动赔偿公益损失，促进古墓葬及周边环境及时修复，依法支持被告人与检察机关达成附带民事赔偿协议，并将被告人足额赔偿情节作为重要酌定从轻处罚因素予以考量。该案依法审理落实了全面追责及刑事、民事责任相协调的要求，彰显了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推动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人文环境一体保护的司法价值取向。

八、孙某林等15人盗掘古墓葬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6年至2017年，被告人孙某林等15人经交叉结伙、事先策划，在青海省都兰县热水墓群血渭一号大墓东北角、东侧平台处及血渭牧场（俗称羊圈墓）多次进行盗掘，窃得大量文物。其中，1个金属材质碗变卖获利20余万元，50余克带花纹金片变卖获利2万余元。经鉴定，被盗古墓葬为唐代时期吐蕃墓葬，分别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兰县热水墓群重要组成部分和夏尔雅玛可布遗址。查获的646件文物中，一级文物14组、16件，二级文物49组、77件，三级文物132件，一般文物421件。

在血渭一号大墓东北角的盗掘行为造成地波探测安防一期工程破坏，产生修复费用40.64万元。在羊圈墓盗掘所挖盗洞，产生回填费用2400元。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孙某林等被告分别承担上述费用以及开展抢救性发掘和搭建古墓保护棚产生的费用。

【裁判结果】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孙某林、夏某、苏某奎、索某等15名被告人违反国家文物管理制度，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葬，均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其多次盗掘古墓葬，盗掘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应依法惩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或者具有自首、立功、主动缴纳罚金和公益赔偿金等情节的，依法予以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系累犯的，依法从重处罚。经综合考量，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至六年，并处罚金30万元至5万元；被告人犯数罪的，依法并罚。依法没收车辆等作案工具，在案646件文物由扣押机关移交都兰县文物行政部门。考虑到破坏古墓葬历史价值、科研价值难以评估，并结合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的经济能力，确定本案公益赔偿金额为40.88万元，判决各被告分别缴纳81498.18元至218.18元不等。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对各被告人的定罪及对孙某林等13人的量刑，改判另2名被告人的刑期；维持一审判决的其他判项。

【典型意义】

本案系盗掘古墓葬引发的刑事案件。被盗古墓葬属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境内的热水墓群，其中，血渭一号大墓是迄今为止热水墓群乃至青藏高原上发现的结构最完整、体系最清晰、形制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对研究唐代吐蕃历史文化、唐蕃关系与民族交流融合等具有重要价值。孙某林等人的盗掘行为严重损毁古墓葬本体结构，严重破坏古

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人民法院在依法严惩盗掘古墓葬犯罪行为的同时，正确贯彻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依法合理认定民事责任范围，统筹考量各被告人的刑事、民事责任，并明确判决将在案文物全部移交文物行政部门。该案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严惩重大文物犯罪、推进文物与环境一体保护和系统治理的坚定决心与责任担当，对保护传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激发全体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自强，具有重大积极意义。

九、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检察院诉陈某平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21年7月11日，陈某平在贵州梵净山景区排队前往梵净山金顶时，使用登山手杖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梵净山金顶摩崖”石壁处进行刻划。虽有其他游客提醒、劝阻，陈某平仍执意在该石壁处刻留“丽水陈国”字样。经鉴定，刻划行为造成上述文物和景观价值不可逆损害，经济损失在50000元以上。经委托有关机构制定修复方案，需修复费用60952.08元，勘察设计费38000元。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陈某平承担上述修复费用、勘察设计费以及惩罚性赔偿金50000元并向公众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陈某平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内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梵净山金顶摩崖”处刻划，对文物造成了不可逆损害，也对梵净山的整体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依法应当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陈某平不顾他人劝阻，故意破坏生态环境，结合专家意见、陈某平庭审态度、已受行政处罚等情形，酌定确定其承担相应惩罚性赔偿金。依法判决：陈某平承担文物修复费用60952.08元、勘察设计费38000

元、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金 25000 元，并对其违法行为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故意损毁文物引发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梵净山金顶摩崖”石壁是具有艺术价值的人文历史遗迹，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陈某平的刻划行为不仅造成了文物遗迹不可逆的损害，贬损了该文物的艺术价值及科学研究价值，破坏了景区的整体生态环境，也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产生了严重不良社会影响。人民法院坚持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落实以生态环境修复为中心的损害救济制度，统筹考虑民事、行政责任的有机衔接，实现了惩戒违法、赔偿损失与修复环境的协调统一。该案是人民法院坚持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推进文物古迹与生态环境一体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对于引导社会公众摒弃刻字涂鸦、攀爬踩踏等陋习，树立文明出行理念，营造生态文明建设新风尚，具有重要意义。

十、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诉易县某石料加工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明长城-紫荆关段”于 1996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易县某石料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料公司）于 2014 年开始建设，工厂建筑及道路位于紫荆关长城文物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内，经行政主管部门两次下发停止占用林地违法行为通知书和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仍未停建，后在 2016 年、2017 年又进行扩建，生产经营至本案发生。经鉴定，石料公司石料加工厂建筑及道路违法占用林地、长城文物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开采原料、破碎、筛分，造成遗迹周围大片林地裸露空化，对古长城遗迹

以及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造成的林地生态损失为 528397.81 元；经制定分区修复方案，修复总费用 717876.13 元，所需时间 2 年。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石料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并限期拆除其石料加工厂，修复生态环境或者赔偿上述修复费用，赔偿上述林地生态功能损失并支付等额破坏生态惩罚性赔偿金，负担本案鉴定费，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长城是不可移动文物，属于人文遗迹，符合法律规定的“环境”范畴。石料公司的行为对长城历史风貌、环境风貌的破坏，不仅是对文物本身及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是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的侵害，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行为初始于民法典施行之前，危害后果一直延续，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依法应承担惩罚性赔偿。依法判决：石料公司立即停止对“明长城-紫荆关段”紫荆关保护范围内文物历史风貌、环境风貌及生态环境的侵害，拆除其位于长城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内的石料加工厂；按照鉴定意见确定的修复方案及修复期限，将其破坏的生态环境修复至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如不能按期完成修复工作，则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717876.13 元；赔偿林地生态环境功能损失费用 528397.81 元，并支付破坏生态惩罚性赔偿金 528397.81 元；在国家级媒体向社会公众道歉；负担鉴定费 40000 元。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文物保护范围内违法建设经营引发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也是极为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明长城紫荆关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料公司在紫荆关保护范围内违法建设经营，破坏长城历史与环境风貌，两次被行政处罚仍不整改。人民法院积极践行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主动对焦中央关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大部署，贯彻落实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依法认定石料公司各

项民事责任，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生态效果相统一。为巩固提升长城司法保护能力水平，人民法院以本案成功审理为契机，在长城紫荆关段选址建设了首个长城生态环境修复司法保护（教育）基地，积极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努力推进长城本体及其文化遗产、生态环境一体保护和系统治理。

十一、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民委员会、东埔村民委员会诉奥斯卡·凡·奥沃雷姆等物权保护纠纷案

【基本案情】

祖师信仰是闽南地区重要的宗教信仰，将祖师遗体塑成肉身像并进行供奉是该地区习俗。章公祖师生于十一至十二世纪，在福建阳春青龙山道庵修行并坐化。林氏先人在宋代为供奉章公祖师像而建普照堂，章公祖师像受到当地民众供奉崇拜延续至今。普照堂及所供奉的章公祖师像属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和东埔村集体所有财产。1995年章公祖师像被盗，至今未破案。2015年3月，荷兰王国居民奥斯卡·凡·奥沃雷姆（以下简称奥斯卡）在匈牙利展出一尊中国宋代肉身佛像。两村村民经与照片及祖师遗物对比，发现该佛像为被盗的章公祖师像。两村村委会向奥斯卡主张返还未果，向荷兰法院起诉被驳回，遂于2015年12月向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奥斯卡及奥斯卡独资经营的两家公司返还章公祖师像，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20万欧元、实现债权费用5万欧元。

【判决结果】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案涉佛像与1995年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普照堂内被盗流失的宋代章公祖师像具有同一性，本案应当适用偷盗事实发生时物之所在地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奥斯卡的买受行为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章公祖师像在荷兰仅是一件具有异域特色的文物，但在中国章公祖师像的诞生地、保存地，则是

当地祖师信仰的重要信物，承载着当地众多信众的精神寄托。章公祖师像作为集体所有的传世文物，于法而言，阳春村和东埔村村民对章公祖师像的集体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作为祖师信仰的信物，于情而言，章公祖师像应当返还给信众村民；作为人类遗骸的文化财产，于理而言，章公祖师像亦当回归其原始文化氛围和故土环境。在章公祖师像被偷盗、未经中国政府许可非法出口到国外后，阳春村委会和东埔村委会有权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跨境追索，要求非法占有人返还流失的珍贵文物。依法判决：奥斯卡向阳春村委会和东埔村委会返还章公祖师肉身佛像，驳回两村委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文物物权纠纷引发的涉外民事案件，是民间通过国内民事诉讼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开创性案例，在探索涉外文物司法裁判规则、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方面具有示范意义。一是宣示了我国文物法律的域外适用。首次明确流失海外文物适用被盗时文物所在地法，有力维护了文物流出国利益。二是彰显了我国坚定维护文化财产国际条约的立场。充分尊重文化财产条约关于“保护文化财产免受偷盗、秘密发掘和非法出口的危险”及“便利文物返还和归还”等精神，对国内法作出与国际条约目的和宗旨相符的解释。三是为阻断我国文物海外流失提供了司法支撑。从文物涉外交易及出境的禁止性规定、案涉佛像作为人类遗骸的文化财产属性等角度，阐明盗赃文物的买受行为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为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追索海外文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对文物销赃海外亦具有警示和防范作用。

十二、北京宣房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诉吕某霞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北京市西城区达智桥胡同12号×号平房系直管公房（以下简称案涉公房），坐落于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杨椒山祠（明代名臣杨继盛故居）内。2000年，吕某霞与房管部门就案涉公房签订租赁合同。北京宣房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房公司）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授权，行使直管公房的全部经营管理权。2015年12月，北京市文物局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公告施行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杨椒山祠（松筠庵）保护措施的信》，后由宣房公司公示了房屋腾退政策和方案。本案双方未能就案涉公房腾退及补偿安置问题达成一致，宣房公司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案涉公房租赁合同，吕某霞及其女陈某腾空案涉公房、拆除自建房。诉讼中，宣房公司提供北京市房山区稻田一路1号院的一套房屋，供二人临时周转居住。

【裁判结果】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使用不可移动文物，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宣房公司作为公有住房的经营管理单位，有权依法履行文物保护职责，其依据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公函，经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同意，制定了腾退安置方案，与吕某霞一方进行了房屋腾退安置的洽商。在双方未能就腾退协议达成一致的情形下，基于相关法律规定，宣房公司有权要求解除合同，但同时应保障相对人的合法居住利益。经核勘，宣房公司已为吕某霞一方提供了适当住房，可以判定具备腾退条件。对于安置、补偿问题，当事人应当依法另行协商妥处。依法判决：确认解除吕某霞与宣房公司正在履行的案涉公房租赁合同；吕某霞、陈某将案涉公房腾空后交予宣房公司，同时搬至宣房公司提供的周转房屋居住；案件受理费由宣房公司负担。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文物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引发的民事案件。案涉公房所在的杨椒山祠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由于居民租住等原因，祠内文物建筑年久失修、损毁严重，安全隐患突出，多年来社会各界一直呼吁加强保护工作。该案是当地文物保护腾退系列案件之一，人民法院严格公正司法，正确适用文物保护法、合同法相关规定，在推动文物及时腾退的同时保障被腾退人合法居住利益，实现了保护文物与保障权益、法治力量与司法温度的有机统一。在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还积极探索司法审判与文物保护相结合的专业化机制，并强化与有关部门沟通、配合，推动提升文物保护整体水平。该案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服务大局、维护首都核心区古都风貌保护的使命担当，为加强不可移动文物集群司法保护及类似案件办理提供了参考样本。

十三、刘某庆等4人诉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物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1929年2月，红四军主力在大柏地伏击来犯的国民党军队，战斗十分激烈，在村前墙壁上留下很多弹洞，毛主席著名词作《菩萨蛮·大柏地》中“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即追忆此段历史。土地改革时期，瑞金县政府将红四军大柏地战斗战场遗址“弹洞前村壁”的两间房屋（以下简称“弹洞”两房）等财产分给刘某仁、刘某庆、刘某庠（割禾客）、刘某华（刘某娣）、麻某连所有，并于1953年3月10日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之后，刘某仁将“弹洞”两房交给其弟刘某泮居住。1969年，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从刘某泮手中接管“弹洞”两房，并进行了局部维修。2007年4月15日，在《红四军大柏地战斗战场遗址简介》的碑文中载明该遗址原为“刘某泮私宅”。刘某庆、刘某庠、刘某序、刘某华系刘某仁与麻某连生育的子女，知晓碑文简介内容后，向江西省瑞金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返还“弹洞”两房。审理过程中，刘某庆等人变更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将碑文中的刘某泮变更为刘某仁、刘某庆、割禾客、刘某娣、麻某连。

【裁判结果】

江西省瑞金市人民法院认为，“弹洞”两房系土地改革时期政府依据当时的土地政策分配给刘某仁、刘某庆、刘某庠（割禾客）、刘某华（刘某娣）、麻某连所有，且办理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后未再进行变更登记。红四军大柏地战斗战场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中“弹洞”两房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任何人不得对其损害。文物保护单位应对其妥善管理，碑文简介中该遗址原为“刘某泮私宅”确有错误，应予以更正。依法判决：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将“弹洞”两房前碑文《红四军大柏地战斗战场遗址简介》中“刘某泮”的名字变更为“刘某仁、刘某庆、割禾客、刘某娣、麻某连”。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革命文物物权纠纷引发的民事案件。革命文物承载着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录了中国革命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保护、利用好革命文物，对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意义重大。刘某庆等人起诉主张返还“弹洞”两房，根源在于其认为碑文简介中原住户名称有误导致自身权益受损，诉讼目的主要还在于“正名”。人民法院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统筹兼顾加强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强化释法析理，促进矛盾纠纷妥善化解。该案是人民法院为革命文物保护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生动探索，为丰富、完善文物司法裁判规则积累了有益经验，对于引导社会公众全面、正确树立文物保护理念，督促文物保护单位增强尊重历史、注重细节的责任意识，具有宣传教育意义。

十四、吉林省靖宇县人民检察院诉靖宇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杨靖宇将军殉国地位于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濛江乡保安村，是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省级重点烈士纪念保护单位。2020年，白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门颁布《白山市杨靖宇将军殉国地保护条例》，规范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其中明确规定，靖宇县退役军人事务主管部门负责杨靖宇将军殉国地日常保护管理工作。靖宇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存在游乐园、烧烤屋、游船等经营活动，影响爱国主义精神弘扬，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遂向靖宇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全面履行保护管理职责，依法对杨靖宇将军殉国地保护范围内餐饮、娱乐、野炊、露营、垂钓等与纪念、瞻仰、悼念烈士无关且有损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管，责令改正，恢复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庄严、肃穆的环境氛围。靖宇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未按要求履行职责，靖宇县人民检察院向靖宇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在审理过程中，案涉娱乐设施全部拆除，靖宇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撤回起诉。

【裁判结果】

吉林省靖宇县人民法院认为，靖宇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整改，履行职责，实现了公共利益的保护，靖宇县人民检察院自愿申请撤回起诉，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准许撤回起诉。

【典型意义】

本案系有关机关怠于履职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杨靖宇将军殉国地是党领导人民顽强奋斗、抵御外辱的重要见证，是承载独特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革命文物，是弘扬英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宝贵财富。人民法院坚持多元共治和源头治理的理念，依法延伸审判职能，加强与检察机关、行政主管部门沟通协调，对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推动形成文物保护合力，促成各项问题及时、妥善解决。该案依法审理有效维护了英雄烈士的荣誉与尊严，积累了加强革命文物和红色文化遗产司法保护的探索性经验，对促进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尽责，推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具有示范意义和导向价值。

十五、西安某建材有限公司诉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2014年7月开始，西安某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材公司）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始皇陵保护范围内占用土地建设预拌混凝土扩建项目。2017年3月，陕西省西安市规划局临潼分局将该线索通报给西安市临潼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以下简称临潼文旅局）。同月17日，临潼文旅局就建材公司“未经文物部门批准擅自施工”立案调查，并责令建材公司限期拆除、恢复原貌。此后，临潼文旅局两次向建材公司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及听证告知书，并根据建材公司申请依法组织听证，履行法定程序。其间，秦始皇陵博物院两次对临潼文旅局征询意见函作出回复，称建材公司施工已对秦始皇陵文物安全及周边历史风貌造成影响，破坏了秦始皇陵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并认为在该区域内不宜进行与文物保护无关的建设工程。2019年3月11日，临潼文旅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建材公司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定，责令其拆除违法建筑，并处罚款30万元。建材公司不服，诉至西安铁路运输法院。

【裁判结果】

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建材公司未向文物行政部门申报办理审批手续，擅自在秦始皇陵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定。临潼文旅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判决驳回建材公司的诉讼请求。

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行政相对人不服文物行政部门处罚决定引发的行政案件。秦始皇陵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是我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建材公司擅自在秦始皇陵保护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影响秦始皇陵的文物安全和历史风貌，破坏秦始皇陵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应当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文物行政部门依法对建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人民法院依法监督、支持文物行政部门严格执法，形成了打击违法、保护文物的有效合力。该案从线索发现到司法裁判的整个过程中，人民法院、文物行政部门、文物单位及有关行政部门多元联动、依法履职、各尽其责，是共建新时代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法治屏障的成功范例。

最高检发布新业态治理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2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新业态治理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总结推广各地开展新业态治理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典型经验，旨在凝共识聚合力，更好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批案例共4件，包括：上海市检察机关督促履行点播影院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浙江省诸暨市检察院督促履行电竞酒店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河北省任丘市检察院督促履行盲盒市场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督促履行密室剧本杀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记者了解到，此批案例的发布，是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意见的务实举措。在对点播影院、电竞酒店、盲盒、密室剧本杀等新业态治理工作中，各地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未成年人检察业务集中统一办理优势，依法能动履行检察公益诉讼职能，充分发挥综合司法保护作用，以“我管”促“都管”，推动各方依法充分履职，并积极发挥数字检察优势，赋能新业态监管，在开展调查取证、确定监管对象、提起公益诉讼、促推协同治理方面均取得了较好成效。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最高检将持续强化对下业务指导，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履职办案的精准性、规范性和时效性；不断强化全社会对新业态存在的未成年人保护风险隐患、监管盲区、治理难点的认识，推动各方协同共治，补齐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短板，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案例一 上海市检察机关督促履行点播影院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点播影院 行政公益诉讼 一体化履职 行业治理

【要旨】

针对点播影院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经营不规范、制度不完善、安防措施不健全等突出问题，检察机关发挥一体化优势，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推动行政监管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促进类案监督和诉源治理，同时促进行业自律自治，实现未成年人保护与保障新兴业态健康发展的双赢多赢共赢。

【基本案情】

上海市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2020年1至6月，有部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发生在点播影院内。经选取30余家点播影院进行抽样调查发现，点播影院普遍存在登记备案制度落实不到位、治安措施不完善、行业规范不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沈某某强奸案中发现，沈某某有两次性侵行为发生的场所均为点播影院。经调查发现，点播影院在数量快速增长并受到未成年人追捧的同时，普遍存在未依法登记备案、包间高度私密、变相提供住宿服务、未成年人无需身份验证可随意进出等情形，存在未成年人遭受性侵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侵害的隐患。电影、文化执法等行政主管、监管部门没有充分履行对点播影院的监管职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点播影院、点播院线管理规定》《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导致对点播影院监管治理不到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侵犯社会公共利益。

2021年4月，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在实地摸排、走访行政监管部门、召开座谈研讨等工作的基础上，于4月15日分别向区文化执法大队、区新闻出版和电影管理办公室制发检察建议，提出探索建立点播影院接待未成年人管理制度、开展行业专项检查、加强信息沟通形成监管合力等意见。两家被建议单位高度重视，全面

采纳检察建议内容，组成联合检查小组对全区点播影院进行检查，并联合区检察院、公安分局出台《奉贤区未成年人出入点播影院五项规定》。5月，区文化执法大队、区新闻出版和电影管理办公室分别对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向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书面回复。

针对点播影院监管不到位问题，上海市浦东、静安、长宁等区人民检察院也结合各区实际，通过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等方式，推动综合治理。在此基础上，2021年9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向上海市电影局制发检察建议书，提出深入推进点播影院市场规范整治活动、明确点播影院经营监管规范、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指导点播影院加强行业自治等几方面建议，并同步抄送市文化和旅游局执法总队、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动多部门协同履职，齐抓共管。为进一步凝聚共识，唤起社会各方对点播影院涉未成年人保护问题的重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举行了检察建议公开宣告送达活动，邀请被建议单位、被抄送单位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检察院人民监督员、特邀监督员共同参与，听取相关单位关于整改方案和初步落实情况的介绍，并共商治理措施。

收到检察建议后，各被建议单位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规范点播影院行业治理。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积极推动下，上海市电影局、文化和旅游局执法总队协同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开展了全市点播影院市场规范整治活动，累计检查相关场所1400余家次，立案处罚11件、关停240余家不合格影院，点播影院市场规范程度显著提升。市电影局还指导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成立了全国首个点播影院专业管理委员会，出台行业规范，就场所治安管理、未成年人保护措施、强制报告制度落实等统一规范，补齐法规空白，引领点播影院这一经营模式走上法治化发展的轨道。

【典型意义】

点播影院作为文化娱乐新模式，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的同时，其中隐含的未成年人保护风险也应引起重视。上海市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上下级院一体履职的优势，在依法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类案的同时，敏锐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在

依据实际确定监管对象的基础上，通过采取公开宣告送达、将检察建议主送行业主管部门，抄送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方式，促进相关职能部门明确权责，齐抓共管。并推动成立全国首个点播影院专业管理委员会，出台行业自治规范，引导企业合规经营，实现了未成年人保护与新兴业态健康发展的双赢多赢共赢。

案例二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电竞酒店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电竞酒店 行政公益诉讼 公开听证 专项监督

【要旨】

电竞酒店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易滋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检察机关积极履职，通过公开听证厘清争议焦点，出台类案办理规则，明确完善监管路径，督促行政机关落实监管责任，推动相关部门协同加强对电竞酒店监管。依托数字赋能，搭建监督建模，创新研发应用，实现对新业态行业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

【基本案情】

2021年，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发现，在网吧等单一业态的互联网营业场所监管日益规范的背景下，电竞酒店以“住宿+上网”的混业经营模式，以酒店住宿的方式接纳多名未成年人无限制上网，并引发多起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等人盗窃案中发现，陈某某等人冒用成年人身份入住某电竞酒店，实施无限制上网、在酒店房间实施盗窃、购买烟酒等行为。电竞酒店存在经营管理漏洞，未能严格执行身份查验、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且存在无证经营并违规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等问题，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发现线索后，诸暨市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2月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在全市范围内经采取实地踏勘、询问入住及服务人员、发放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梳理调查发现，2021年以来诸暨市共有电竞酒店11家，内设电竞房190间、上网电脑480台；电竞酒店持有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但均以配置高端电脑、可多人玩网游等互联网上网服务作为主要招揽手段；部分电竞酒店为方便未成年人入住电竞酒店和随意上网，存在他人代开房、一人开房多人上网等现象；部分电竞酒店违规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等。由此引发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夜不归宿、逃学辍学等不良行为，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亟需加强监管。

依据现有规定，电竞酒店为混业经营模式，经营性质及监管主体不甚明晰。为凝聚多方共识，寻找监管路径，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场监管局等行政机关代表、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益诉讼观察员担任听证员。会上，听证员围绕法律适用争议及实践困境等方面充分发表意见，对电竞酒店应当按照旅馆住宿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进行双重管理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各部门应当形成监管合力，主动加强对新业态监督管理。在此基础上，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向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向市公安局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在对电竞酒店住宿进行监管的同时，重点对电竞酒店接纳未成年人无限制上网问题加强监管。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职能部门及时督促整改，2022年4月，均回复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积极采纳、全面落实检察建议内容，依法处罚电竞酒店16家/次，对电竞酒店实行“住宿+上网”双登记制度，为全市电竞酒店的电脑安装了上网登记管理软件，有效对未成年人无限制上网问题进行监管治理。

在个案办理的基础上，为构建机制促推系统治理，2022年3月18日，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在诸暨市政法委牵头下，推动市文广旅游局、市市场监管局等十部门出台《“电竞酒店”新业态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细化责任分工和目标任务，建立联席会议、信息互通、线索移送、协同治理等机制；并推动市商务局、市公安局、市文广旅游局、市市场监管局四部门出台《“电竞酒店”行业管理规范（试行）》，促推行业长效治理。

在通过案件办理促推电竞酒店治理过程中，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数字检察优势，通过数字建模，治理平台应用，以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保护，全面筑牢治理防护网。一是构建数字监督模型。通过归集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发生地信息、电竞酒店经营信息、未成年人住宿登记信息等核心数据，在浙江检察数据应用平台构建“电竞酒店新业态监督治理模型”，通过对上述数据的比对分析，梳理出电竞酒店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及电竞酒店发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二是加强对重点人员和设备的数字监管。通过对电竞酒店入住人员登记数据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据碰撞，梳理出经常出入电竞酒店沉迷网络、夜不归宿的罪错未成年人46名，将其纳入诸暨市人民检察院自主研发的“星海守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平台开展教育矫治、分级干预。推动相关部门为全市11家电竞酒店的电脑安装上网登记管理软件，该软件安装后，需经实名登记并人脸识别后才可开卡上网。三是研发应用完善治理路径。研发“电竞酒店数字化监管应用”，利用旅馆住宿登记数据、上网登记数据、罪错未成年人数据碰撞比对，实现电竞酒店后续接纳未成年人入住、上网异常情形的实时预警，以数字化手段督促行政机关加强监管，完善“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长效治理路径。

【典型意义】

作为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新兴业态，电竞酒店受到众多未成年人青睐。检察机关积极探索符合数字文明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路径，通过数字化监督系统发现问题，通过数字化应用靶向施治，一体推进电竞酒店涉未成年人保护线索发现、调查核实、检察监督、综合治理。同时积极凝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合力，将个案办理经验上升为类案治理规则，有效堵塞新兴业态监管漏洞，推动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

案例三 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盲盒市场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盲盒市场 行政公益诉讼 公开听证 校园周边 综合保护

【要旨】

针对校园周边盲盒销售侵害未成年人权益问题，检察机关切实履行司法保护职责，综合运用公益诉讼和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以司法保护助推政府、学校、社会、家庭保护协同发力，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近年来，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门类多样的盲盒充斥校园周边市场。经营者针对未成年人消费盲目性强、易沉迷等特点，诱导未成年人冲动消费，借机向未成年人销售质量不合格、真实产品与包装宣传不符、内容不适宜未成年人等问题盲盒产品，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2年3月，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央视“3·15”晚会关注到，许多中小校园周边有盲盒销售盛行的现象。部分家长也反映孩子沉迷盲盒消费，影响身心健康。发现该未成年人保护案件线索后，任丘市人民检察院对本地校园周边盲盒销售情况展开调查，发现4所学校周边13家文具店均有大量问题盲盒在售，涵盖文具、玩具、卡片等多种类型，且全部针对未成年人喜好设计。盲盒乱象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质量低劣，大量来源不明的“三无”玩具、文具被做成盲盒专门向未成年人销售；二是虚假宣传，大量盲盒外包装与内部实物严重不符；三是内容不适宜，大量产品外包装使用了未获授权的照片、图片，部分产品印有“约女神”等不适宜未成年人的宣传词汇；四是易诱导冲动消费，盲盒产品的不确定性易诱发未成年人冲动消费，并因大量重复购买造成资源浪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针对

盲盒销售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任丘市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3月18日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

为进一步凝聚共识，2022年3月25日，任丘市人民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作为听证员，并邀请市人大常委会、团委、教体局、市场监管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及部分中小学校教师共同参与，对当前盲盒乱象涉及的相关违法问题、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所受侵害及如何推进盲盒问题治理进行深入探讨，达成治理共识。听证会后，任丘市人民检察院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开宣告送达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对全市盲盒市场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依法查处不合格盲盒产品；进一步规范盲盒经营者经营行为，经营者向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应事先征得监护人同意；加强与教育部门联系配合，对校园周边盲盒销售场所实施长效监管；畅通举报渠道，公布举报电话、平台，鼓励线索举报；加大宣传教育，引导经营者知法守法、合规经营。

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检察建议书后高度重视，制定《任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盲盒经营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针对货源批发市场和校园周边零售商铺两个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检查，涉及商铺630余户，下架不合格盲盒产品69类3500余件，并向盲盒销售商铺印发关于整治盲盒等市场秩序的告知书，明确向未成年人销售盲盒背后存在的常见违法问题，引导经营者守法经营。5月底，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检察建议整改落实情况书面回复任丘市检察院。

同时，任丘市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教育部门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针对学生购买盲盒普遍、盲盒销售广泛存在于学校周边的问题，建议教育部门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的联动合作，指导学校切实履行保护职责，关注校园周边盲盒销售乱象，及时发现并移交线索；加强对在校学生的风险提示和引导教育，维护学生合法权益。任丘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当地教育部门制作《致家长的一封信》，呼吁家长与学校共同关注未成年人消费状况，帮助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消费习惯，及时举报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各所学校及时加强对学生消费观念的引导教育，部分学校专门开设财商小课堂，帮助学生培养

正确消费观念，实现学校保护与家庭保护同频共振、同向发力。以司法推动社会、政府、学校与家庭同向发力，促进盲盒问题治理。

为保障治理效果，任丘市人民检察院持续跟进，分别于2022年6月和9月对校园周边盲盒销售情况两次开展“回头看”，临时抽查53家盲盒商家，各类不合格盲盒产品在相关商铺中已下架，盲盒产品摆放货架的显著位置张贴有“理性消费”“禁止不满8周岁未成年人独自购买”等警示标识，经营者守法意识显著增强，社会保护力量得到有效激活，学生扎堆购买盲盒的现象得到有效改观。

【典型意义】

校园周边盲盒乱象侵犯广大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聚焦未成年人保护难题，以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为抓手，能动履职，推动社会、政府、学校、家庭协同发力，以“我管”促“都管”，形成共治格局，使当地盲盒市场秩序得到有力净化，长效治理机制得以初步建立，有力践行了“以司法保护助推其他五大保护落实落地”的未检工作理念。

案例四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密室剧本杀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密室剧本杀 行政公益诉讼 分类施策 诉源治理

【要旨】

针对密室、剧本杀行业的监管难题，检察机关可以聚焦不同问题分类施策，推动相关部门立足职能，联合整治。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推动行业自治、牵头行政执法单位建章立制等方式，促推全国行业监管制度的完善，促进对新兴业态的良法善治。

【基本案情】

上海市密室、剧本杀门店数量位居全国第一，门店选址位于学校周边的占比12%，但由于该行业属性不明，准入门槛低，装修设计缺乏标准，存在疏散通道狭小或封闭，消防器材缺失等问题，容易引发火灾等安全隐患。部分剧本包含有血腥、暴力、迷信等违禁内容，容易诱发未成年人心理不适甚至模仿违法犯罪行为。大部分商家未根据内容向未成年人作出提示，无时长限制接纳未成年人游玩，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2021年8月，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部分涉案未成年人热衷参与密室、剧本杀活动；在开展法治副校长工作的过程中，也有多名学生反映，在密室、剧本杀体验时遭遇人身侵害及因其内容和环境产生心理不适等问题，密室、剧本杀等业态可能存在侵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情况和隐患。经调查，闵行区的密室、剧本杀场所有40余家，经营者无须登记经营范围，无须许可审批，选址与建设存在随意性，不受《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约束；许多经营者的内部装修与消防配置不符合消防法及地方消防条例的相关要求，存在火灾风险；有些剧本内容存在暴力、色情及封建迷信等元素；部分经营者为了规避风险，要求玩家签署《免责声明》，特别是面向未成年消费群体时，店家均未根据其身心特点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同时，经向全区中小学发放并收回近2万份调查问卷样本发现，50%左右的中小学生对了解或体验过密室逃脱、剧本杀，大多数学生玩过含有恐怖、暴力内容的剧本，部分学生反映曾在密室逃脱中发生跌倒、惊吓甚至是性骚扰的问题。经评估，尽管现行法律并没有禁止未成年人体验密室剧本杀活动，但该行业存在的违禁内容与安全隐患已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相关行政部门却并未履职到位，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受到了严重侵犯。2021年9月，闵行区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

检察机关在调查中发现，基于现有规定，工商登记无法明确剧本杀行业经营范围，密室剧本杀场所是否属于娱乐场所并应办理行政许可存在争议，如何落实消防监管尚不明确。面对密室、剧本杀行业“弱规范”问题突出、经营监管及多个执法单位的难题，闵行区检察院召开专题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和市区两级相关行政执法单位共同研究，

在执法理念、履职协作、监管服务方面达成共识，同时邀请企业代表座谈，听取法治保障需求。2021年10月，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聚焦不同的问题分类施策，针对密室剧本杀经营场所存在的消防及治安隐患，针对剧本内容违禁等问题，根据《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出版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向区文旅局制发磋商函，建议其加强对剧本娱乐活动内容监管并探索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消防法及地方消防条例的规定，建议区公安分局加强对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的治安管理、消防监督检查及消防宣传教育。相关职能部门立足各自职责，联合开展密室逃脱、剧本杀行业隐患排查治理专项活动，开展检查240余户次，下架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剧本24个，整改隐患问题53处，责令整改7家，取得积极成效。

在个案办理的基础上，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聚焦诉源治理，牵头起草了《密室剧本杀行业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倡议书》，倡导企业在内容自审和分类管理、设置未成年人专区、落实强制报告等7方面履行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责任，推动40余家企业在经营场所张贴跟进落实，促进行业自治。针对该行业规范性文件不足的问题，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又会同公安、文旅、市场、消防等五部门于2021年12月会签了密室剧本杀行业规范管理工作办法，提出探索内容分级、适龄提示、查验未成年人身份、规范时间管理等未成年人特殊保护措施。

【典型意义】

密室逃脱、剧本杀逐渐成为广受未成年人喜爱的新型娱乐、社交方式，也是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检察机关能动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针对行业归属不明确、涉及多部门执法的困境，以专题研讨凝聚共识，以分类施策联合整治，督促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同向发力。